



火箭筒班训练记

晓 阳

小时候看过一部电影《哥俩好》，片中一个情节让我记忆犹新：刚入伍的双胞胎兄弟大虎和二虎参加授枪仪式，大虎领到一支冲锋枪乐得咧嘴直笑，而二虎领到的是56式半自动步枪，因而愁眉苦脸大闹情绪。我当时不以为然，很赞同片中老政委讲的：拿冲锋枪还是步枪并不重要，关键是要打得准、发挥它的最大威力。

但是，当我下连后，在授枪仪式上领到了属于我的武器——一只铁制的草绿色长方形四〇火箭筒装弹箱时，心里恐怕比二虎还不是滋味。

我所在的班是四〇火箭筒班，装弹箱是火箭筒副手的标配。大概是班长看出了我的心思，安慰我说：你可别小看了这家伙，这可是咱们连的新式武器。

我们那时装备的四〇火箭筒，构造十分简单，就像两头一般粗的空心钢管，上面有准星缺口和扳机握把。发射时炸雷一般地响，不像后来配发的69式火箭筒，配备了光学瞄准镜，尾部也改装成了喇叭状，用以消音和减轻后坐力。



郭建荣在辅导民兵训练，使用四〇火箭筒。（照片由作者提供）
因为本文作者的第二任班长就

“四〇火”的操作相对简单，训练时主要进行卧、跪、立三种姿势据筒、瞄准、击发。正射手右手握握把，左手手心向上握筒身，将筒身靠在右肩颈窝处，歪着头把腮帮子贴紧筒身便于瞄准。此时两手腕要靠紧以增强火箭筒的稳固性。卧姿据筒时，身体要与筒尾成60度角，以防发射时喷出来的尾火烧了腿，击发时嘴要微张，为的是防止耳膜被震坏。副射手的动作更简单，将火箭弹和发射药结合好，再把火箭弹尾部的钢翼片拢起来递交到正射手手中就算齐活了。尽管训练枯燥乏味，我们还是十分认真地反复练习。

全营组织五个连的火箭筒班实弹竞赛，我们在一个黄土沟里的断崖上用白灰画了一个坦克正面靶，五个班的火箭筒手在100米射击地线依次射击。快轮到我时，搭档的老兵递给我一团棉花，让我把耳朵堵上，我说用不着。那时我满脑子的“大道理”，“难道打仗时也要堵耳朵吗？”只是没说出口。

按照规则，我们每人发射两枚火箭弹。第一枚我按照动作要领沉着冷静地据筒瞄准击发，“咣”地一声巨响，火箭弹飞着弧线正中靶心，而我却被震得七荤八素耳鸣眼花，五脏六腑都似挪了位。稀里糊涂打出第二发，眼瞅着在靶子下沿炸响，兄弟班有人站起来喊：“脱靶了！脱靶了！”

我们班长站起来说：“嚷什么？我们打的就是坦克履带！”

那次打靶，耳鸣三天后才消失。多次打靶后，落下个耳背的毛病，有时非但听不清对方的话（特别是方言），还常常听岔，有的时候能岔出十万八千里。记得我临时任某参谋集训队队长时，有一天回总队机关办事，遇到一位总队首长匆匆忙忙往值班室赶，路上问了我一些集训队的情况，快到值班室时说了一句“火车爆炸了”（值班室报告某火车站一列车厢有爆炸物爆炸，首长去值班室处置情况），我听成他问我“伙食怎么样”，便顺嘴答道：“挺好的，挺好的。”搞得首长狐疑地瞅了我好几眼。

上世纪70年代中期，连队训练由“五大技术”转为“三打三防”，其中以打坦克为重点。全连准备到某坦克团进行打坦克实地训练，出发前上级首长要来连队作动员，连长说，通常首长动员完了一定会问“同志们有没有决心？”我们一定要声音洪亮，连喊三次“有！有！”以显示出我连的气势。为此全连反复练习了几遍。谁也

没有想到那位领导动员末了说的是：“是狗熊是好汉，训练场上比比看，怎么样，不含糊吧？”这一下乱了套，战士们有的答“含糊”，有的答“不含糊”，还有有的不知该如何应答。

坦克团派出两辆T-34坦克配合训练，训练场在一处丘陵地带，坦克沿着固定的土路绕着圈子摇摇晃晃哐哐地开着，我们则头戴树枝编的伪装帽，抱着炸药包埋伏在路的两边，等坦克开过来冲上前投掷炸药包和反坦克教练手雷。这些动作是我们平时对着泥土堆起来的坦克练熟了的，现在想起来就像小孩过家家玩打仗。

这种野外训练晴天还好，遇到刮风时可就糟了，坦克一动，尘土飞扬遮天蔽日，训练一天下来，我们都成了泥猴。我们班有个老兵是个干净人，平时衬领白白的，裤缝捋得笔直。那天晚饭后，连队安排捆绑被摔坏的炸药包，排长进来检查时，这位老兵说：“排长，我们是火箭筒班，在路边练瞄准就行了，用不着上去扔炸药包了吧？”排长眼一瞪说：“胡扯，都把筒子放到一边，老老实实地捆炸药包去！”

现在我想，信息化条件下的现代战争，恐怕一般不会抱着炸药包打坦克了，但是当年那种严格训练以及对战斗精神的要求是应该传承下去的。

祖辈 姥姥二三事

梁变惠

单位领导从老家带回一对清末民初的胆瓶，蓝釉清亮，淡雅宜人，造型别致，他小心翼翼地用棉布擦去灰尘，甚是谨慎。

此情此景不由让我想起了姥姥。姥姥已去世十几年，回想起来，她仍是那个头扎白围巾、一身青布衫、绑腿、有着一双三寸金莲的小脚老太太。

姥姥家的木柜子上，也摆放着一对这样的胆瓶，胆瓶的中间还有一个梨花木质的穿衣镜，那是姥姥的陪嫁物。儿时我常住姥姥家，每天清晨起床后，姥姥就开始清扫卫生，总是很仔细地擦拭那两个胆瓶。吃过早饭后，我会脱鞋爬到柜子上，从两个胆瓶中掏出一些好玩的东西，乐此不疲地摆弄着，姥姥从不责骂我。

后来我求学于外地，每两周回家一次，每次返校前总会和姥姥去道个别。姥姥每次都会从门后的一个小瓦罐里拿出一些好吃的给我，有杏干、饼干，最神奇的是我一年四季都能吃到姥姥巧妙保存的月饼，想来这些应该是有人看姥姥留给她的。但姥姥舍不得吃，怕变质就会放到这个容器中，以这种方式来保存，在那物资匮乏的年代，应该是我最美味的食物了。

一晃毕业成家为人母，偶尔会在梦中见到姥姥，她还是那么慈祥，一只手拄着拐杖，一只手抬到眼睛上方挡着斜照过来的阳光，站在大门口，向远处张望着……

故乡 故乡美食

薛 克

故乡洪洞距离太原约三百公里，以往十年也难回一趟。老爸生前说要把自己这片老叶子埋在故乡，父命难违，我们把他结束了病痛的骨灰埋在了故乡的山坡上，也由此开始了每年回乡祭扫，当然同时可以饱餐故乡美食。

那些镌刻在心底的地理性标志味道，只有故乡有，别处没有那股“土”味：羊杂汤、粉条丸子、臊子面、蟠糕……

故乡的羊杂里不放粉条，除了羊杂，还放了葱段，自有一股洪洞味道；粉条丸子从未在其它地方见过，粉条煮软，剁成一厘米左右小段，放入盐、五香粉，以蛋清、少许面粉裹之，捏成丸子，上笼屉蒸五六分钟成形，这样直接吃还是欠点味道，再熬一锅调料汤，关火前放入韭菜，把汤浇进盛入丸子的碗里就得了，哎，想想口水就快流出来了；臊子面简单点，豆角、金瓜、豆腐切成食指盖大小的丁，与猪肉丁同炒，也可放入金针、木耳、蘑菇丁，菜汤要多，关火前加一把韭菜提香；故乡名之蟠糕者，馅饼也，特点是皮特别薄，透过面皮能看到绿色的馅料，在鏊子上煎得两面金黄，轻轻一咬，脆脆的面皮即破，馅料里的韭菜香味和油香味随之炸开四溢，溢进口腔，溢进鼻腔，溢进心底。

忽然发现，爱吃的故乡美食多离不了韭菜。现在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韭菜，不论哪个季节回到故乡，想吃臊子面、粉条丸子、蟠糕，随时可一饱口福。



我们平遥人爱吃辣椒，平遥的辣椒好吃，早已名声在外。已过世的母亲曾是乡亲们公认的种辣椒高手。

种辣椒之前，要先烧制火土，这是一道特殊的工艺。

立春过后，母亲挑一块荒地，将地里杂草割下来摊开，铲些草皮盖了，用树叶点然后慢慢烧，然后把它翻过来任凭风吹雨打日头晒，直到变成黑黝黝的火土。

春分前后，天气暖和了，母亲在院里翻一小块地，将火土撒在地里，用手反复拨弄，盖上的火土均匀平整了，才从衣袋里掏出个纸包，纸包里包着辣椒种子，母亲把种子撒下去，再撒几把火土，等待种子发芽。

十几天后，土里冒出细细的芽来，密密麻麻。辣椒秧子长得快，开一片叶子，又开一片叶子，一片叶子搭在另一片叶子上，把一块地遮得密不透风。等长到一拃高的时候，挑一个阴天，母亲就会把它们栽到自留地里去。

地早就翻好，分了畦，畦上刨些浅坑，一畦五行，一行十个，横竖对得整整齐齐。把辣椒秧子带泥挖了，粗壮的，一个坑里栽一根，不那么壮的，一个坑里栽两根或三根。在不到一天的时间里，辣椒就完成了一次简单的迁徙。以后，隔六七天母亲会去扯一次草，施一次肥，杀一次虫。慢慢地，辣

父母

母亲种辣椒

天 柱

椒的枝丫像手指一样叉开，开始长成树的模样，白色的花苞从枝枝节节上嘟噜嘟噜冒出来。

花苞终于在母亲的期盼里变成花朵。一朵朵白色的小花，像一个个细小的星星，连着一个稍微弯曲的绿柄，埋在碧绿的枝丫间。过几天，白色的花朵便洋洋洒洒，叶子的光芒黯淡了下去。再过几天，辣椒结出来了。米粒大小的它们，寻求叶子的庇护，然后偷偷地抽个儿，沉甸甸地往下坠。到了端午节，辣椒熟了，一个个坠满树上，站在地边望过去一片青幽，馋得我直咽口水。

改革开放前，家乡细粮很少，粗粮不好吃，全靠辣椒送下肚。母亲每天收工回来，都会拐向地里摘些辣椒回家炒，一进院子就能闻到辣椒的香味。咬一口玉米面窝窝，夹一筷子辣椒，吃一口高粱面糊糊，夹一筷子辣椒，一口一口辣椒伴着粗粮下到肚子，辣得我们嘴里不时发出“咝咝”声，赶快喝两口小米汤，头上豆大的汗珠滚落下来。

我离开家乡40多年了，每年春节回去，母亲都要把挂在墙上的几串串干红辣椒拿下来，倒进铁锅里用油炒，炒至褐色倒出来，捣成辣椒面，走时往我包里装两瓶，并嘱咐：“吃完了告妈，让人捎去。”这么多年，我没有辣椒吃不下饭，辣椒少了饭不香。

如今，母亲离世三年了，我再也吃不上母亲种的辣椒，好想念远去的母亲。

除署名外，其它图片选自百度网